

你担心机器人抢人饭碗吗

王尔山

机器：为什么你会需要我的帮助？

如果看英文原文，还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关于这机器怎样抓住一些重点词汇进行重复，变成它的回应。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设计，却得到了大量的好评，许多用户坚信自己就是在跟人类医生说话，并且，跟这位医生聊完出来，自己的状况大有好转。

最终，这程序不仅带上“人工智能”和“聊天机器人”这样一些计算机科学领域标签传世，还多了一个跨界标签，就是 Eliza 效应，用于描述下意识愿意将机器行为与人类行为等同起来的倾向。

这就成了俄罗斯套娃，因为 Eliza 这名字源于另一个故事，里面也有一个效应，这就是萧伯纳名作《皮格马利翁》，科学家说他的聊天机器人就像女主角 Eliza，出身下层社会的卖花女，可以通过接受语言学家的训练而掌握上层社会的言谈风度，谁也看不出破绽。

而萧伯纳的灵感又源于希腊神话，说的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精心雕刻的少女雕像，爱得如此入迷，最终感动了天神，决定赋予少女生命，两人得以喜结良缘。从那时就有了“皮格马利翁效应”，描述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自己喜欢、钦佩、信任和崇拜的人的影响和暗示，“说你行，你就行”。

这故事就变成，先是科学家将自己设计的聊天机器人命名为 Eliza，“拔高”这个设计，因为这机器并不能像戏中女主角那样从语言学家那儿学会另一套说话方式；同时，在用户这边，好像与科学家心有灵犀一般，也出现了“拔高”的印象，用户愿意相信这机器就是听得懂他们的话，尽管它其实听不懂，并且科学家也把程序公开发表了。

有没有可能，他们愿意“高看”的，其实都是人类的能力，期待尽快达成目标，从而让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也与有荣焉？

此处适合加画外音：大师萧伯纳早已洞悉了一切，或者说，一切都没逃出古希腊智者的预计。

也是在这时，我会觉得，担心机器人抢人饭碗的人，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不是还要多久我才能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掌握造“人”秘诀，可以按需定制？（生娃这事儿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人类迄今未解之谜，还不能“定制”。）

在他们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这还不算乐观，我还有第二个理由：人类迈向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也被他们选择无视了。

我们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有多严峻？外国有报告说，从 2010 年到 2050 年，在我国，每 100 位适龄劳动者要分担抚养的老人和小孩，从 36 人变成 63 人。

看完这组数据，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先来 100 个机器人，让那宝贵的 100 个人类劳动者可以指挥这些机器人，先将劳动者的总数加倍，变成 200，这样看起来才比较“正常”，比较不那么压力山大。

因为我不是乐观主义者。

反过来，能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足够发达而人类已经加速迈向老龄化这两个现实条件前后夹击之下依然选择担心机器人抢饭碗的人，可不就是乐观主义者么，他们相信人类能抢先造出机器人，然后一切继续尽在掌握。

——下一次要测试对方是不是乐观主义者，估计可以加一个问题：你担心机器人抢人饭碗吗？



像这样：
用户：我男朋友让我来的。
机器：你男朋友让你来的？
用户：他说我情绪低落。
机器：我很难过，听到你说你情绪低落。

用户：是真的。我很不开心。
机器：你觉得到这里来能让你变开心？

又或是这样：
用户：最近觉得很不开心。
机器：你常常觉得很不开心吗？
用户：是的，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机器：为什么你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用户：你能给我说说吗？
机器：那我就说说。
用户：跟我说说吧。
机器：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用户：不能，我就是觉得不开心。
也许我是在担心什么事情。
机器：你这样担心有多久了？
用户：两星期。
机器：说下去。
用户：我需要你的帮助。

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词“人间有味是清欢”，有一种克制的淡然的美好。那是他某次在山庄的农家做客，偷得浮生半日闲，品一杯清茶，尝一盘山间鲜嫩的蓼芽蒿笋，淡而有本味，心情舒畅，不由感慨：人间最有味的就是这清淡的欢愉啊！

在我的体会中，“清欢”不仅是淡淡的喜悦与欢愉，更是平凡生活里的一丝诗意。生活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坚硬尖刻的，就像苏轼坎坷的人生、屡遭贬谪的仕途，他经历过丧妻丧子之痛，品尝过生活的苦楚，但依旧会有一些脆弱美好的时刻，让人心里稍微一软，悄悄地释放了一抹温柔。

苏州园林拙政园中有一亭，名为“谁与同坐轩”，得名于苏轼的词《点绛唇》。亭子筑于西园水中小岛的东南角，背衬葱翠小山，前临碧波清池，精致小巧。亭名是一个问句，奥秘要到苏轼的原词中寻找：“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

“有味”的苏轼

闫 晗

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原来“与谁同坐”的答案却是没有旁人，独自一人，名字起得很妙。

人生的诸多路程，无人相伴，只有清风明月作伴，有许多时刻，那些隐秘的孤独、惆怅和欢愉，无人可诉，无人能懂，也并无期待，只有一个人在这明月下清风中默默感受和咀嚼。

苏轼一直善于捕获那些隐秘的诗意，对于能懂他的内心的人，也是惺惺相惜。明曹臣《舌华录》中说了个关于他的小故事，广为流传。苏轼一日饭

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高山流水，朝云是他的知己。

廖一梅有句名言在文艺青年中盛传——“每个人都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无论古今，陪伴常有，了解和共鸣却很奢侈。苏轼对这“了解”

念念不忘，多年后还写诗怀念朝云：“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忆幽州。”

苏轼的《定风波》里有一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那句诗眼“此心安处是吾乡”出自于朋友王巩的妾柔奴之口。王巩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到广西宾州，小妾柔奴随行，两人一起在宾州生活多年。当王巩奉旨北归时，途中宴请苏轼。数年不见，苏轼发现王巩不但没有憔悴落魄，反而神采奕奕，性情豁达，苏轼问其原因，王巩告诉苏轼，这几年来多亏有柔奴相伴，有相知相爱之人一起度过寂寞的岁月，才不觉艰苦。苏轼问柔奴：“岭南那里不好吧？”柔奴却豁达地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东坡大为震惊和赞赏，于是有了那首词。

是苏轼总能遇到妙人呢，还是这些人愿意在苏轼面前表白自己内心的诗意和温柔？或许都有吧。

笔会

铁艺人体

（雕塑）

韩美林



稀的孙姓老太太，她在一次晨练时偶然看到我在自学英语，过几天就悄悄借给了我几本原版书籍，其中包括萨克雷的《名利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她的名字应该是孙可琼，因为书的扉页上有“孙可琼购于上海”几个字，可能是她当年购买时随笔记下。）

不多久，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杨先生的中国文学翻译。孙老太太让我大吃一惊，说她曾与杨先生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共事过。

她更主动提议，说要为我这个“好小人”给杨先生写封推荐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给我一些帮助。那时对我来说，杨先生简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人物，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英语学习不再是那么政治不正确了，孙老太太说，写这样一封信应该没有什么风险。信她写了，给我看了，也寄了出去。只是，后来却一直没听她说起有任何回音，我也不好意思问。

在“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中，我考进了华东师大英语系。翌年，又越级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卞之琳先生攻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此同时，在卞先生的鼓励下，自己也开始写诗、译诗。那时候可谓年少气盛，更不知天高地厚。到北京不久，就借着孙老太太写过推荐信的头，拿了自己发表在《诗刊》上的几首诗，附上英译，去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自报山门地拜访了杨先生。

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惊讶。尽管杨先生那天对我说，想不起曾收到过孙老太太的那封信。不过，他还是在办公室里把我英译稿读了一遍，更当着苏格兰专家白霞的面加以夸奖，说我的英译几乎能在《中国文学》上直接发表了，不需要走刊物的寻常编辑流程。

《中国文学》当时是中国唯一一本向外介绍当代中国文学的刊物，设有一位专职中文编辑，首先得由他从国内刊物上选定政治正确的作品，然后由几个英文编辑翻译，最后再由担任主编的杨先生或其他外国专家修改、润色后发表。他居然能这样评价我的译文，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后来我有好几首诗，还有一篇报道 1986 年在洛杉矶举行的中美作家会议的英文稿，都因杨先生的坚持，直接发了出来。读研究生的日子难免手头拮据，《中国文学》的稿酬不无小补，也更鼓舞了我用英文写作的自信心。（许多年以后，我在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何谷理教授曾说起，他最早就是在《中国文学》上读到我的名字，在我获福特基金后联系学校的过程中，因此第一个回信表示欢迎；接着他更网开一面，把我所修的创意写作课都算进了比较文学博士课程的学分。）

那些在北京读研的日子里，我自然不会偶尔跑一两次杨先生的办公室，便感到心满意足。他当时住百万庄外文出版社的办公楼后面，有时我在编辑都没找到他，就下楼穿后门直奔他住所，也不打电话预约一下。

但杨先生好像一点都不在意。他家里时不时也有其他客人，于是就招呼坐下来一起聊。白霞当时正与外文社的一位德文专家在谈论婚嫁，经常过来串门；多年后在伦敦重逢的汉学家 Johnathan Mirsky 是那里另一位常客。据他自己说有一次喝得晚了，稀里糊涂倒头就睡在沙发上，半夜醒来，听到不远处戴先生鼾声如雷。“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杨先生夫妇两口子都善饮，每每以酒代茶，海阔天空。在这些一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闲聊中，我也醺醺然了，尽管我一直都未能学会饮酒。

还记得墙上有张放大的杨先生照片，戴先生开玩笑说是“茅山老道”。这或许指其（隐）士大夫的风骨。在我的心目中，杨先生现在也多少像是从茅山上，而不是奥林匹斯山上走了下来。

1981 年，我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杨先生兴冲冲对我提议说过，要我去《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为了说服我家里同意，他还亲自给我在上海的妹妹打了好几通长途电话。只是，后来却因为种种怎样都解释不清楚，像卡夫卡在《城堡》中所写的荒谬过程，我还是被一路分配回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不过，杨先生的这份情我是欠下了，我十分清楚，纵然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还。这里不仅仅有他个人对我的知遇之恩，杨先生其实是由衷希望我能与他一起工作，更多地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这是他早年从牛津毅然归来，始终抱定的“宗旨”。

回上海工作后的那几年，每次去北京出差，我都会去看他。我当时在翻译艾略特、叶芝等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有新书出版，也会带过去。或许因为不是中译英，或许因为我最终未能到外文出版社与他一起工作，他

没太多说什么。

1988 年，我要去美国做一年福特访问学者，行前去北京出差，顺便给杨先生辞行。我带了几首与国梁兄前一阵子同去温州采访时写的诗，附上英译，再加两瓶国产的皇朝葡萄酒。杨先生在门口接下酒，眼中似有狡黠的一闪，戴先生在一旁咕嘟着什么。

那天，杨先生在客厅里读了那几首颇有主旋律意味的诗，笑呵呵地说，“至少你的文字还不算拖泥带水。”想起来，这恐怕是他关于我写作仅有的一次批评。我没告诉他，到了国外还有一个计划，准备开始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

翌年夏天，我突然想起杨先生，往他家里打过去一个电话。他不在，戴先生接电话说，“他很好，出去散步了。请放心。”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也一直没有杨先生的任何消息，像一夜间突然消失了似的，像唐诗中所写的那样，“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英语中有一句成语，“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也只能试着如此安慰自己。只是远远地还时不时会想起杨先生。

一直要到本世纪初，才辗转联系上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白霞，从她那里得到消息，说杨先生患癌症住进了医院。那一刻，我想到了叶芝的“1916 年复活节”。因为我想到杨先生为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承受的牺牲，也因为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念杨先生的名字，在遥远的祷告中，像在叶芝的诗中那样。

下一次回国，我立刻就联系了杨先生的女儿，问她是不是方便去医院看他。据他女儿说，现在来看他的人寥寥无几，故人老去，他挺寂寞的。我去看他，只要时间不太长，应该不会影响他治疗——也可以带烟酒去，他的日子或许不多了，喜欢怎样就怎样吧。她还加了一句说，“他也看过你的英语小说，挺喜欢的。”

杨先生生性豁达，这些年的鸡虫得失，他或许根本都没计较过。只是，看到他躺在一家甚至都缺乏专科医疗条件的医院里，我和那天同去的查理，杨先生的另一个忠实美国读者，都不知道说了什么了。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杨先生其实只是轻描淡写几句，波澜不惊。我倒是预先排练过，说早先受他影响翻译的一些古典诗词，后来在英文小说中引用了，国外读者反响还不错，现在正准备结集出版。他反而宽慰我说，能用英文写中国的小说也好，不一定非要从事翻译不可。他还赠送了我几本新作，签了名。

后来还有几次去看杨先生，因为他身体的关系，不愿他讲话太多，多是我在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也带去新出版的陈探长小说。当然也带上烟和酒。最后一次去看他，是在他小金丝胡同的家里。那天他午睡刚醒，身体明显衰弱了，得由人搀扶着慢慢地在对面坐下。可他立刻还是笑嘻嘻地说，“中华，又可以抽好烟了。”在这刹那，他眼中似乎又掠过狡黠的一闪，就像多年前去他家辞行的那一天。

回到此刻，回到老书虫书店活动的现场，一位年轻的女播音员用中文声情并茂地读着，接着这场活动的英文主持人再用他浑厚的嗓音读：“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 / 他们曾梦过，死了，就够了；/ 就算过多的爱在他们生前 / 让他们困惑，那又怎样？……/ 现在，或是在将来时间；/ 那所有披上绿色的地方，/ 都变了，都已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不管叶芝怎么感叹自己文字无力，却是用他的诗句写下了真正的不朽，远在这异国的语言中，在这许多年后，仍在读者的心里激起反响。

我写不出这样的诗。

但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在获悉杨先生患病的那个晚上，为什么会想到叶芝的“1916 年复活节”。接着想到外文出版社的那份电子邮件，觉得至少可以把那本古典诗词的英译稿好好修订一番，尽力争取不负杨先生当年的厚望。这也是我的本分吧。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